

脉望
丛书



君子之交

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
往来书简

文洁若 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洁若 编译

君子之交

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
往来书简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文洁若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脉望丛书)

ISBN 978-7-208-12321-2

I. ①君… II. ①文…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791 号



· 脉望丛书 ·

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

文洁若 编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21-2/I·1259

定价 28.00 元

序 一

孙玉石

萧乾先生是我非常尊敬仰慕和广大读者深挚热爱的作家，翻译家。他的许多作品，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丸山升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他专门研究鲁迅和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出版有《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思想》、《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他从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文艺黑线”荒谬批判的反思，从潘汉年、萧乾等沉冤个案的考察分析到整体观照的视点，深刻思考论述处于复杂政治背景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及其背后的潜深问题。1986 年 3 月，他发表了《关于潘汉年·初稿——1930 年代群像之一》。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 10 月，他又连续发表了《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两篇学术论文，全面论述了萧乾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及其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的坎坷遭遇与悲剧命运。2005 年 9 月，丸山升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所作的《后记》里，这样说道：在“文革”结束之后的 80 年代，

他所写的关于萧乾的这两篇论文，“不论是在同即便在中国、反右后也被人遗忘的萧乾相遇的意义上，还是在成为更广泛地追溯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契机的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都可谓开拓研究新阶段的论文”，“这两篇论文，我不仅得到萧乾、文洁若夫妇的各种指教，此后还承蒙赠予今天不易买到的珍贵旧著，感受到他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厚情意，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值得纪念的。”由此可见，丸山升先生与萧乾、文洁若伉俪之间之心与心相通的异国情谊了。

1986年，文洁若女史到日本做一年的研究工作结束。归国之前，她与丸山升先生在东洋大学第一次晤面。丸山升先生后来说，当时“我去拜访了她，听了不少事情”。1988年10月，丸山升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学。他与夫人丸山松子一起，曾经前往萧乾家里造访，倾心交谈。2005年11月，文洁若特别往北京邮电疗养院宾馆，再次与前来参加学术会议的丸山升先生夫妇，相晤于一室。2006年11月26日，丸山升先生因病离世，文洁若女史在《萧乾与丸山升的君子之交》这篇悼念文章里说：“我们和丸山升、丸山松子伉俪的友谊延续了二十年。实际上只见过三次面，其间鱼雁往还，有时打电话交谈。”在三次相晤之外，丸山升先生为学术研究，也为翻译工作，曾与萧乾、文洁若夫妇，多年里“鱼雁往还”。他们让各自寻真和友情心血，流淌在这点点滴滴的墨翰中了。现在这一册《往来书简》，就是这三位异国文学友人寻真和友情的心与血的结晶了。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往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与

丸山升先生共事一年半；十年之后，我又往神户大学文学部讲学一年半，与丸山升先生也多有交流。近二三十年里，我与丸山升先生和他带领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同事和学生们，结下了难忘的真挚情谊。几天前，我的学生吴晓东教授，自外地开会归来告知，上海的薛羽先生编辑了《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一书，托他转达，邀我为之写一篇短序。出于对于萧乾、文洁若两位文学家辉煌业绩的仰慕之情和她们不幸遭遇的真诚关注，也出于自己对已经离去的日本挚友丸山升先生和夫人松子的怀想和感念，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我首先相信，这是一本将会令人警醒和沉思的异国友情的书简。读者接触和阅读这些文字之后，可能会走近一个充满沧桑也充满友情的世界。他们将会深深认识到：这部《往来书简》，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三位相知相识而又非常杰出的作家、学者，在人生经历上，在学术认知上，在历史沉思上，在关于当今和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上，所进行的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这些隔海飞鸿文字里，蕴含着一份难得的真诚和特殊的意义。

在过往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同是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同是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他们又同是历史真理的守望者。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1939年，作为香港《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萧乾，前往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全身心投入了维护人类正义和尊严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生入死，历时七载，在硝烟炮火中，日以继夜地以自己热诚的生命和笔，写下了许多沾满了血与火的文字。因为参加争

取民主的运动，丸山升先生在读书期间，被当时政府拘捕坐牢，在监狱中坚持读书写作，完成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自60年代以降，他又长期从事战后日本争取民主的运动，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走向的复杂现实和历史教训等深层次问题。1946年自欧洲归国后，萧乾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拒绝离开祖国，用自己的生命和笔，呼啸抗争，守望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和民族良知。他因为自己抗争呼啸的声音，恪守真理的文字，执着理性的艺术追求和坚守，被误解，被批判，被冠以“反动作家”的恶谥，到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经过十年浩劫，在很长的时间里，倍受精神的蹂躏和肉体的凌辱。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高尚理想和精神追求。他坚守着自己拥有的那份灵魂真诚和不屈风骨。他所经历的和他所追求的，体现了中国自古代的屈原以来那些骨头坚硬的知识人的精神辉煌和深广内蕴。也许正是这样一些文学品格，良心坚守，苦难经历，不屈精神，吸引了丸山升先生学术关注的思考和目光。萧乾不仅成为丸山升先生的学术探究的对象，而且成为他心有灵犀精神相通的异国知音和友人。这部三位异邦友人合出的“往来书简”，就是萧乾、文洁若伉俪和丸山升先生之间深层精神交流和心灵对话的结晶，是20世纪中日两国知识人拥有的良知和清醒的见证。

2005年9月2日，丸山升先生离世之前一年，在他写的那篇《后记》里，这样清醒而富有卓见地认为：中国40年代的文化界，“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

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创伤。”

真理的坚守与认识清醒密不可分。萧乾在《八十自省》一文里，曾经如斯说：“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客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萧乾先生还这样的倔强自白：已然迈入“八旬老人”时光，自己精神却“并没有老迈感”，“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读了这些自白后，我总是在想，但愿我们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人，都应该努力学习和承传前辈们的这样精神，如是思考：怎样去努力做到，使自己的脑子和灵魂，能够永远地“这么清醒着”，乃至“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作家苏叔阳曾回忆说，在一次等候会议开始时，与萧乾先生谈起华北沦陷时自己的遭遇：“我指给他看我脚腕上的旧疤，告诉他那是日本人的狼狗咬的。他吃惊地看着我的旧疤问为什么，我告诉他，什么也不为，我和同伴在街上玩，日本兵牵的狗就扑过来咬。他的脸色忽然阴沉起来，说：日本人应该知道耻辱，每个日本人都应该知道。”

萧乾先生、文洁若女史、丸山升先生，都是有这样气质耿直而执着追求精神的人。丸山升先生在他所写的深刻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许多文章里，在他呕心沥血写成的论述潘汉年、萧乾等遭受巨大磨难经历的文字中，都并非纯学术性地追求历史的真实，而是饱含着一个富有良知的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清醒和责任，对于世界范围内更为广大的历史深痛经验和教训的沉重思考。丸山升先生谈及萧乾在自己作品选集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他难以忍受‘文革’中的迫害想要自杀，对夫人文洁若说一起死吧，但文洁若说：‘不！我们要活下去。活着要看这帮恶魔的灭亡！’于是他打消了这一念头。我读到这一段时深受震撼。因为虽然深切严重的程度无法相比，但我个人也有类似的体验。”

萧乾先生、文洁若女史、丸山升先生，就是这样一些有着“类似的体验”的历史的清醒者。在他们留给后人的诸多著述和译作中，在他们这部精神交流的心灵对话里，他们都在各自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朴素文字，从已逝的艰难岁月和往昔那些痛苦纠结的历史中，反省着，沉思着，倾诉着，也向人们无声地呼喊，目的是要让世世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知道：什么是人的耻辱，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间正道”，什么是不能凌辱和不可摧毁的“人”所拥有的铮铮硬骨和精神光耀，什么是用多少生命和鲜血凝铸而成的永远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教训！

2014年4月28日深夜改毕

序 二

陈子善

人生有些经历的瞬间真是很奇妙。我阅读《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以下简称《往来书简》)书稿，竟然发现，我不但与丸山升先生、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都相识，而且与他们通信中提到的许多人，譬如文坛前辈沈从文、冯至先生，同行友人李辉、傅光明诸兄等，也都相识，甚至熟识。也因此，阅读这部通信集，于我而言，不仅是在重温信中不断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瞬间，也在重温我与三位写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一些前辈和友人的交谊片断。这样倍感亲切的阅读体验，在我是并不很多的。

我与丸山升先生有过其实并不密切的交往。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学界是继竹内好、竹内实之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80年代，丸山先生数次到沪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我因此有机会结识这位彬彬有礼的日本学界前辈。首次与他见面应在1986年10月，这有他和伊藤虎丸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事典》一书上的题词为证。《中国现代文学事典》由丸山升、伊藤虎丸和新村彻先生合作主编，1985年9月日本东京堂出版，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重要的日文工具书。在我保存的《事典》前

环衬上有如下的毛笔题词：

陈子善先生：

此书本来我们友人铃木正夫赠。现在我们访问上海见陈先生，题字为念耳。

伊藤虎丸 同赠
丸山升

一九八六、十、三十 锦江饭店

题词出自伊藤先生之手，丸山先生的签名则是他的亲笔。我与伊藤先生已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一年前在浙江富阳举行的纪念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丸山先生却是首次。当时匆匆，本欲再找机会拜访，继续请益，别人提醒我，丸山先生是严重肾病患者，即便在客中，也要定时到医院人工透析，时间宝贵，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当然不便再打扰而作罢。当时我的医学知识贫乏得可怜，根本不知“人工透析”为何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我对丸山先生为了学术，为了中日文学界的学术交流抱病来沪，深感敬佩。

丸山先生回日本不久，就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著《上海物语》，1987年10月集英社初版，列为“中国的城市”丛书之五。书中签条上有他的钢笔题字：“陈子善先生指正 丸山升敬赠”。我是后学，由此也可见丸山先生的虚怀若谷。《上海物语》在丸山先生众多论著中大概不占显著地位，但日本讲谈社2004年7月又将其收入“学术文库”重印，

相信还是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书中的论述起于近代上海开埠、租界形成，止于抗日战争爆发，重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和日中文人交际的查考和阐释，颇多发见。在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上海热”著述中，《上海物语》虽不显赫，却也是得风气之先之作。

1997年秋，我到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丸山先生得知后，特意召集他所主持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同仁为我举行座谈会，记得尾崎文昭、藤井省三诸兄等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说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忆，不外是讨论我当时正在从事的梁实秋、张爱玲等曾长期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记得丸山先生听了我的发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发掘和整理了这些作家的许多作品和史料，很好，希望能进一步介绍他们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当时怎么回答的，也已不复记忆。后来读到丸山先生1989年就已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他在文中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时，就曾表示：

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侧面被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被揭示，这都是使人高兴之事。不过，到目前为止，坦率地说，我感觉到这些多侧面、多样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孤立起来看的，而其相互间关系以及这多种要素在整个文学史中以何种方式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合力以推动文学史——对于这些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当然，对于过去相对来

说没有加以研究的流派和作家，与其性急地评价其意义与作用，不如暂时从缓，先集中精力去对被埋没的作家作品进行再发掘，对事实加以整理。我也能理解这样做的重大意义。只是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我觉得如果能与再发掘和整理的工作相并行，对于包括上述多种要素和多样流派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内部规律再稍加议论，恐怕更好吧？^①

可见这是丸山先生一贯的观点，他对重新爬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新的整体把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具启发性，也尤其值得我深思。

萧乾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复出的作家之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他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包括他主编《大公报·文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在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毅然决然奔向北京，他本不应该遭受那么多的坎坷与磨难。我是从《一本褐色的相册》和《负笈剑桥》两书开始认识萧乾先生的，首次在京拜访萧乾先生的时间则是1988年1月27日，因为我保存着他当时题赠我的两本小书，一为《北京城杂忆》，另一为《萧乾西欧战场特写选》，前者的落款时间就是“1988.1.27”，后者的落款时间也为“一九八八

① 丸山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

年元月”。记得那天他谈兴甚浓，我告辞时，他还叮嘱我，下次到京，希望再来聊聊。

后来我遵嘱又数次叩响萧乾先生家的大门，有时文洁若先生也在场。记忆最深的一次是1997年秋，台湾《联合报》副刊主办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术研讨会，“联副”主编痖弦先生邀请了萧乾先生，也邀请了我，并希望我能陪同萧乾先生前往。为此，我专诚到京谒见萧乾先生商议，因年事已高，他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此次台湾之行，这当然是件极为遗憾的事。而我最终也未能成行，只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中国大陆三四十年代文学副刊扫描》。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往来书简》上来。《往来书简》收录丸山先生与萧乾、文洁若先生的往还信札共32通，其中丸山先生致萧、文先生10通，萧、文先生致丸山先生22通，时间跨度为1986—1999年，正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时期。因此，这批值得珍视的书简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丸山先生与萧、文先生的文字之交和文人之情，更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4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这批书简主要围绕一个重点而展开，那就是因郭沫若先生1948年3月发表《斥反动文艺》而引发的一桩著名的文坛公案。这得从丸山先生的一篇长文《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说起。丸山先生自己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后来将其并续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一起收入中译本《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时，曾特别加以

说明：

关于萧乾的两篇，不论是在同即便在中国、反右后也被人遗忘的萧乾相遇的意义上，还是在成为更广泛地追溯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契机的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都可谓开拓研究新阶段的论文。^①

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丸山先生明确表示，若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文艺界拨乱反正，萧乾重返文坛，他未必清楚了解其人其文，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广泛地去追溯和思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正是与复出后的萧乾先生的“相遇”和相知，给丸山先生提供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契机，进而拓展和深化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以前拜读《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其续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时，我就注意到前者的《附记》和后者的《写在前面》。前者的《附记》说：

撰写本稿时，曾去函向萧乾、文洁若夫妇请教两三个疑问。交稿后，收到了回信。谨在此表示谢忱。关于《拟J. 玛萨里克遗书》的写作背景，也承蒙一并赐予宝贵的指教。在本稿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无须订正。关于

① 丸山升：《后记》，《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406页。

这一点，容于其他机会再作论述。^①

后者的《写在前面》说：

去年5月，我写了《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文。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我向萧乾、文洁若夫妇提出了两三点疑问。排出校样后，收到恳切的答复，同时承蒙示知当年的一些我原先所不曾了解的背景资料。在《附记》中我写到：“在本稿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无须更正。关于这一点，容于其他机会再作论述。”

本稿就是尔后我根据这个线索重新作调查而写的。固然也参考了萧乾夫妇的信函，但要说明，对事实的认识与评价，必须由我本人负责。^②

从这两则话又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丸山先生撰写这两篇重要文章时曾向萧乾夫妇“请教”，得到了“恳切的答复”。但“答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读者一直无从知晓。二十八年之后，随着《往来书简》的公开，谜底终于揭

① 丸山升：《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0页。此文作于1988年5月，发表于1988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

② 丸山升：《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7页。此文作于1989年10月，发表于1990年日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开了。

从1986年11月29日萧乾先生致丸山先生的第一封信起，他就把我们带回到波诡云谲的40年代末。1947年7月，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次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斥反动文艺》。一个月后，萧乾又作《拟J.玛萨里克遗书》予以回应。这段文字交锋的复杂历史背景，萧乾先生当时的想法、后来的遭遇和写信时的新的认识，等等，在信中一一展露无遗。特别对如何理解《拟J.玛萨里克遗书》，萧乾先生几乎作了逐字逐句的具体解释。

郭沫若先生的《斥反动文艺》是40年代后期现代文坛上的一篇“名文”。文中点名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先生，分别斥之为“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反动作家”，萧乾之所以是“黑色”，因为他属于“标准的买办型”。^① 这一点名和猛烈批判，非同小可，且影响深远，正如丸山先生在《建国前夕文艺界的一个断面》结尾时所沉痛地指出的：“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创伤。”萧乾先生这一系列答复丸山先生的信，大概是第一次敞开心扉，对这个敏感的历史“创伤”作了较为深入和痛切的回顾，也促使丸山先生在《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

①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原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集（文艺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65页。